

黄时鉴文集 I



大漠孤烟

蒙古史 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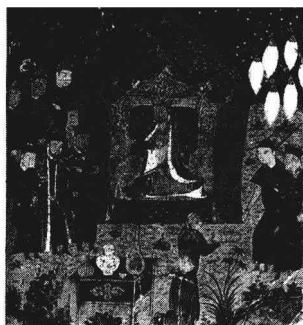
中西書局

黄时鉴文集

I

大漠孤烟

——蒙古史 元史



中西書局

本书出版得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韩国研究基金”和浙江大学海外中国形象研究中心的资助

序

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大学里度过的。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2008年对我来说有点特殊的意味，到了那年，我在大学里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已历半个世纪。这五十年经历的事情不少，但学术生涯却很简单，先是在内蒙古大学任教近二十一年，以后就一直待在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当然，严格说来，我在2001年末退休，任职并无半个世纪，但退休后仍继续做研究，自以为这样的学术纪年也可以算数。2008年底，蓦然自问此生如何？回顾往日，别的事情似乎已渐模糊。可是所撰之文，白纸黑字，倒是清楚的。于是动手搜检，编出一个目录，计算字数，约有百万余字。

有了目录，相关的存本大体上也翻了出来，再将它们厘定分编。十几年以前，1998年出过一本《东西交流史论稿》，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尚有约七十万字，无非是抽印本、复印本、电子本，另有两篇未刊稿。分编不难。我做的历史研究，由于兴趣较广，似乎采点分散，不过归纳起来，也就两个领域，一是蒙古史元史，二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现将文章厘为三卷，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卷：大漠孤烟——蒙古史元史。1953年进北京大学时适逢高教部在北大历史系和物理系试点改本科为五年制，从三年级起是分“专门化”的，我被分在中国近代史组。1958年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不久转入新建的蒙古史研究室。写论文是从蒙古史开始的，个人署名发表的最早论文是收入本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

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它反映了我原来的学业背景。后来，在编写内蒙古史纲的过程中，除了近代，工作上需要兼顾清代和明代，于是学术的关注点逐渐上移，写了几篇清代蒙古史的文章，明代的未能成文，仅留有一份“明代蒙古可汗世系表（稿）”。从1972年起，随着《元史》点校工作的展开，我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元史。治元史，比诸治其他中国断代史，在语言上要求更高一些，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也更复杂一些。我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起步稍晚，成绩有限。后来，在我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后，元代本体史就基本上搁下了，继续做的只是在元代的中外交流史方面。

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作过一番解说，此处不赘。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作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第二卷：远迹心契——迄于蒙元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在1979年调到杭州大学以后，工作的需要和兴趣的转移使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渐渐把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西关系史。当我以比较熟悉的元代中西关系上伸下延，准备开设古代中西关系史课程时，感知那是一个十分宽广而又饶有兴味的领域，这一方面给我以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使我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才能进入状态并做出一些成果？我选择了先全面了解、打好基础，然后做点的探索和研究。先在授课和带研究生的同时，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从90年代初才超出元代采点探究。1993年我介入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的建立和运作，又使我的视阈扩展到东西交流史。本卷文章就是在这个转变和拓宽的过程中撰写的。

本卷中收有一篇论文《相远以迹，相契以心——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认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第三卷：东海西海——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在我将主要精力用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后，有一段时间还是承袭蒙元时代中西交流的旧业，继续研究若干陆上草原之路和丝绸之路方面的课题；但稍一深入就感到自己的学养多有欠缺，往往举步维艰。同时，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日益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这可能是由于我一开始接触史学时原即关注中国近代史，而如今又身居东南海滨城市的缘故。加上我出国访学主要是去美国，在那里发现的一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也均属这个领域，选出个别项目加以整理，费了不少时间。同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论文选题也较多地汇集于此，看来似乎比较分散，但本意是希望提出一些新的课题，既不蹈履故步，又不趋附时风。

本卷的正标题为“东海西海”。我与龚缨晏教授合作撰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时注意到，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人，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这些认知非常值得

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以上三卷基本上包含了五十年来我所撰写的文章，除了论文，还有一些译文和札记。1998年我编印文集《东西交流史论稿》时写过一篇较长的序言（今收于第三卷），谈过自己在治学方面的一些体会和看法；同年，为《学林春秋》写《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今收于第二卷），又陈述过自己学习史学和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此两文已有重复之处。原先讲过的，今不再赘述。在1998年以后，我继续发表了近20篇论文，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三书。后两书是编著，它们的问世可能有助于在学术层面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史图像资料的开掘和利用。前一书导致我对地图文化交流史生发浓厚的兴趣，这方面的继续探索已成了我晚年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寻找和细读古地图，令我迷恋和陶醉！

在《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中我曾经说过：“就自己的生活而言，我感到人生把握不易。就自己的学业而言，我进入史学专业可以说是偶然的。”一周前，我已到了七十五足岁。现在我想补充说：史学与我不期而遇，然后相伴终生。史学真是一个好专业，而且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更是好专业。它要求治学者有长期的积累，板凳可坐一生冷。即使间或中辍，而若持之以恒，仍有可期。相当一些专业似乎难有这样的适应度。它又可以容纳资质不等的学人，让他们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才能，在辛勤劳作之后收获相应的成果，其容度是十分宽广的。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此生更复何求？

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是缺乏根底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做不出多少成果。但鉴于我以上对史学的认识，在北大受教于众师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治学过程中，就自己发现的问题写下的这些文章，仍想它们可以是铺路之石、盖房之砖。张广达先生在他的文集“总序”中说，他较早发表的研究西域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论文，“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和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拙文显然也大多是对一时、一

地、一事的叙述和分析，但它们在较宏观方面或诸多层面上可资读者参考之处，或就力有不逮了。至于先生这二十年来的深刻体认——在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需要对史学的传承和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反思，需要取得历史知识学层次的一些认识，我就更瞠乎其右，难以企及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拙编文集的性状，可能只是我这样的历史人的境况和勉力而为的一种呈现而已。

走在学术之路上往往是寂寞的。令我欣慰的是，路上不断有一些师友学生同行，切磋互勉，甘苦与共。2008年底想起编这部集子。当时正在读新出的张广达师的文集。从字数看拙文大致也可编成三卷，然而此念一出，即有成语浮现：岂非狗尾续貂？次年秋，去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有机会与他重逢晤叙，在忆旧述业求教中也提及此事，他微笑着说：“那你就续吧！”后来他在通信中对拙撰文章的特点，作了切实的评说，加以鼓励。想起过去他还曾说过“你的作品看来在1987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与我自己的体认是一致的，使我有知音之感，也非常感激他对我学业的殷切关注。

我的撰著，大多是在杭州写成的。到了杭州大学以后，适逢改革开放的时代。在那里，我的学术工作尤其得到沈善洪学长的诚挚而持久的支持，令我难以忘怀。这次文集得以出版，还要衷心感谢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部、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和历史系的负责人沈坚、黄华新、金健人以及陈辉诸教授同仁的关心和支持。想出文集时，正值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新组建的中西书局开张，集团和书局的领导张晓敏、秦志华和徐忠良诸先生等都热忱支持，金柯先生为编务筹划运作费了很多精力，其他两位责任编辑朱彦和安志萍女士也做了大量认真仔细的工作，使本书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告问世，最后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黄时鉴

2010年中秋前夜于杭州苦竹斋

目 录

序 / 1

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 / 1

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 / 18

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 / 37

真金与元初政治 / 48

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 / 63

《大元通制》考辨 / 69

元代的礼俗 / 87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 102

元代乃蛮是蒙古而非色目考 / 113

释《至正妓人行》中的蒙古语及其他 / 120

《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 / 133

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 / 157

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 / 171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
“自治”“独立”运动 / 189

罗依果著《孝经的古蒙古文译本》简介 / 235

波伊勒著《蒙古世界帝国》述评 / 238

桑德尔斯的《穆斯林与蒙古人》简介 / 248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地方行政》述评 / 251

【附】译文三篇

关于金史的两篇讲稿（福赫伯撰） / 260

《蒙古秘史》源流考（洪业撰） / 273

关于术外尼书中若干蒙古宗王的称谓（波伊勒撰） / 310

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13世纪中国的著名诗人。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公认的。同时代人，为《遗山先生文集》作序的友人徐世隆，撰写《遗山先生墓铭》的门人郝经，对他的诗文或许赞誉过高一些。而清代学者赵翼的评价则看来是允当的：“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1]元好问生长在金亡元兴的乱世，他的诗反映了他那个时代。

元好问生于1190年，卒于1257年，享年六十八岁。自他成人以后，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大致上前一半生活在金国，后一半生活在蒙古国。从13世纪初叶起，中国北方业已出现蒙强金弱的形势，蒙古军队逐渐占领了金国的大片土地。1233年四月，^[2]蒙古速不台军进占汴京，元好问离开汴京，北渡黄河。1234年金亡。金亡以前，他于1221年考中进士，后又做过南阳令、尚书省掾、尚书省左司员外郎，是金朝的臣子。金亡以后，他在蒙古国政权下继续生活了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他文名鼎盛。他写了数以千计的诗，诗的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临死前夕；同时，他搜集汇编了近百年诗人的作品，题名《中州集》；又为编纂亡金历史辑录了百余万字资料。凡此种种，人们称道不已。他的盛名甚至使后世一些讲究“名节”之士，对于他关涉起草崔立功德碑一事，^[3]多少

[1] 赵翼：《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清光绪三年重刻本。

[2] 本文之月日，均系阴历。

[3] 1232年冬，金哀宗完颜守绪出汴京，奔归德。1233年正月，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汴京的参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移捏阿不，立卫王子从恪为梁王监国，以汴京降蒙古。时崔立党羽谄建崔立功德碑，草撰碑文之事涉及王若虚、刘祁、麻革、张大节、元好问等人。元好问是否起草或改定过碑文，乃一公案，但他与此事有关是难以抹煞的。若绳以儒家忠君观念，元好问难避“名节”之咎。

也持谅解的态度。但是，问题一涉及元好问与蒙古国之间的关系，那就面目不清，异说纷纭了。郝经的《墓志》说他“金亡不仕”，《金史》以及若干传记年谱也都沿袭此说。^[1]“金亡不仕”，这也是事实，元好问没有再做蒙古国的官。然而，“金亡不仕”四字并不能概括元好问与蒙古国的全部关系。在这方面，元好问还进行了其他一些重要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历史上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钩稽关于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的如下三件史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

首先一件史实是元好问与耶律楚材的关系。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九载有《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2]在这封信中，元好问向正在“辅佐王室”的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提出了一个建议，请求耶律公对于归向河朔的南中士大夫，给以“聚养”、“分处”。他开列了五十四个士大夫的名单，指出这些人“皆夫民之秀而有益于世者也”，并进而对耶律楚材说：这些民之秀者，“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饥，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邴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简言之，元好问是希望耶律楚材保存这批人才，珍惜这批人才，而且有朝一日重用这批人才，使

[1] 参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清乾隆三年刻本；《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顾嗣立：《元诗选》甲集《元好问》，清康熙三十三年秀野堂刻本；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见《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清光绪年间刻本；施国祁：《元遗山先生年谱》，版本同上；凌廷堪：《金诗纪事》卷九《元好问》，193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又1977年，日本西屋贤隆在《金末元初契丹人的动向》一文中仍沿用此说而未作深入分析，见《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八号，第82、84页。

[2]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弘治刊本。

他们能有助于耶律楚材辅佐的“维新之朝”。

关于这封书信，还少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过它的内容与含义。注意到这封书信的人，多半只是认为此书是有碍元好问“名节”的又一问题。此外，也有人注意到这封书信提及五十四个名字，为了解当时的文人名士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线索。但是元好问怎么会寄书耶律楚材？就连乾嘉时期的考史名家赵翼也觉得这个举动“不可解”。“平日料无一面，而遽干以书，已不免未同而言。即楚材慕其名，素有声气之雅，然遗山仕金，正当危机，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1]然而，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元好问的这封书信却是可以理解的。

耶律楚材（1190—1244）原来也是金源臣子，曾任燕京行省左司员外郎。贞祐年间（1213—1216），蒙古军队进袭中原，当元好问避兵南渡时，耶律楚材已在1215年蒙古兵攻占燕京后投向成吉思汗。他是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以后最早明确主张“以儒治国”的人。“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2]他的志向就是使蒙古游牧贵族征服者能够适应中原汉族的农业封建文明，他所引以为荣的就是使中原传统的儒家封建礼文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成吉思汗，尽管已经接触中原文明并开始任用一些汉人和基本上汉化的契丹人，却只是赞赏他的星相占卜之术，而没有采取他的治国方案。楚材跟随成吉思汗十余年，郁郁不得其志。“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将丧是我忧，尚期晚节挽天意，隐忍龙庭且强留”^[3]1229年窝阔台继承汗位以后才开始重用他。由于征收赋税取得成效，他博得窝阔台汗的信任，于1231年被任命为中书令。史称“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4]。

耶律楚材在册定仪礼、括编户籍、制订课税差徭条例等方面，为蒙古国订立了初步的典章制度；他的若干措施限制了蒙古贵族侵害农田直接占役民户的活动，限制了西域商人的斡脱高利贷势力，限制了汉人世侯的某些特权。这样，耶律楚材就作为促使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初期代表人物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寄中书耶律公书》可以看出，元好问对耶律楚材正是有

[1] 赵翼：《瓠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四《和武川严亚之见寄》，《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刻本。

[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三《过燕京和陈秀玉韵·其三》。

[4] 宋子贞：《元故领中书省耶律公神道碑》，见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同而言，而不是“未同而言”。元好问书中说到的“衣冠礼乐纪纲文章”，乃是两人所共有的信仰。耶律楚材作为蒙古国的中书令，已经开始用“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去治理国家，对此，元好问当有所闻，因而书信一开头就写到“阁下辅佐王室，奄有四方，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凡所以经造功业，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等等。这两位同岁的同时代人，耶律楚材比元好问先走了一步，而后来的元好问看来是已经意识到这一步的重要意义的。

元好问写这封书信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癸巳岁，即1233年。寄信的日子，本信开头已写明白，是四月二十二日。蒙古军队是四月二十日进占汴京的，^[1]元好问是四月二十九日离开汴京的。^[2]也就是说，写信的日子，是在蒙古军队入汴京后仅两天，而在元好问出亡汴京以前。可是，这个时候，金主还在归德，金国还没有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元好问已经同蒙古国的宰相直通信息，而且提醒耶律楚材，“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等等。这就表明，元好问在金亡前夕是已经别有所图的。“遗山仕金，正当危机，尤不当先有境外之交”，元好问自当懂得这点道理对一个士大夫具有约束力量。但在没有遭受任何胁迫的情况下，元好问却不理会这点道理，而“先有境外之交”，那就是说，他为了别有所图，只得不顾这些道理的。用世与立节，元好问显然是把用世放到了第一位。

对于元好问的建议，耶律楚材也是重视的。它符合耶律楚材的本意。汴京未下时，楚材已派人入城索取孔子后裔和名儒。他首先要索取的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的孔元措，在元好问书所举五十四人中也正居于首位。蒙古国军队进占汴京后，原来居留汴京的士大夫纷纷北渡黄河，流落在河北、山东、山西一带。1235年编订户籍，耶律楚材奏准从汴京逃亡到河朔的诸生可以定居下来，“官为赡养”。1237年，窝阔台汗采纳耶律楚材的主张，诏试

[1] 《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下》：“〔天兴二年夏四月〕癸巳，崔立以梁王从格、荆王守纯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甲午，两宫北迁。”《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宗五年〕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及梁王从格、荆王守纯等至军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据金元二史所载，蒙古速不台军入汴京当在四月甲午，即四月二十日。

[2] 《遗山先生文集》卷八有七律《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一首，标明了元好问本人1233年离开汴京的确切日期。

诸道进士。通过这次考试，耶律楚材选拔了一些儒生。凡是中选的儒生都免去赋役负担，而且任用他们担任各种官职。这次考试一共选拔了多少儒生，已经难以详考。^[1]但其中就有元好问列出过的秀民贤才，例如杨奂、雷膺和刘祁等。

杨奂（1186—1255），字焕然，号紫阳，乾州奉天人。在金末的汴京，杨奂已为前辈士大夫们所赏识，同赵秉文、李屏山、冯璧等上层名流交往。1233年汴京失陷，杨奂微服北渡，也流落到了元好问所在的冠氏赵天锡门下。元好问与杨奂之间交谊很深。当时杨奂的才名也很大，甚至有这样的说法，“遗山紫阳，一代宗盟”^[2]。元好问本人也十分推崇杨奂，“关中杨夫子，高晦世所闻”^[3]。杨奂也写诗，他的《录汴梁故宫人语十九首》，抒发了思悼亡金的幽情，一段时间颇为流传。其中最后一首甚至是这样写的：“北去迁沙漠，诚心畏从行，不如当日死，头白荒为生。”^[4]但是到了1237年，杨奂已在东平接受了蒙古国的考试，他两中赋论第一，于是耶律楚材荐举他担任了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这样，这位元好问的知己成了亡金士大夫中首次通过考试而进身为蒙古国效劳之一人。蒙古国1237年的考试，杨奂等人的入仕，这正是元好问寄耶律书中所期望的事，也是耶律楚材实际上做到的事。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征服者适应中原农业封建文明，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转变，决不是轻而易举便能达成的。耶律楚材为了促使蒙古族实行这个转变仅仅是作了一些尝试，他已经受到蒙古贵族守旧势力——国俗派的严重阻挠。汉人世侯和西域商人也绝不甘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有如宋子贞后来在耶律公神道碑中所说的：“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

[1]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科日》：“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故《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九年秋八月条所载“得四千三十人”疑有误。此考试事，《元史·太宗纪》与《选举志》均载在太宗九年，即1237年，但元好问撰《杨奂墓碑》载在戊戌年，即1238年。碑文见杨奂：《还山遗稿》附录，《适园丛书》本。

[2] 魏初：《青崖集》卷五《跋宋汉臣诸贤尺牍手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3]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一《赠答杨焕然》。

[4] 杨奂：《还山遗稿》卷下。

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1]。1238年以后，耶律楚材在反对者的强大阻力面前，已极难继续推进自己的事业。后来，他已只能用诗来表白自己对元好问的同情与敬佩以及自己的内疚心情。他的《和太原元大举韵诗》写道：“魏帝儿孙气似龙，而今飘泊固尘中。君游泉石初无闷，我秉钧衡未有功。元氏从来多慷慨，并门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与微之继旧风。”^[2]他也无法进一步荐用元好问摆在他面前的秀民贤才。“野有遗贤犹未用，中书宁得不胡颜”^[3]。他只能叹息，深感惭愧。最后，在守旧势力的排挤攻讦下，耶律楚材“愤悒以死”^[4]。

二

第二件史实是元好问与汉人世侯及世侯幕府人物的关系。

汉人世侯是指在蒙金战争过程中投向蒙古的中原各地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头目。在13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蒙古国对它逐步占领的中原各地，一方面派达鲁花赤进行政治监督，派探马赤军进行军事控制；另一方面依靠汉人世侯来维持统治。当时世侯的权势很大，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称霸一方，父子传袭，兄终弟及。他们一方面依附于蒙古，受到蒙古国政治军事力量的约束和蒙古族社会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力图维持中原汉族地主阶级传统的封建统治。

有见识的世侯，为了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实行有效的封建统治，为了保存中原封建文明的传统，纷纷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1233、1234年以后北渡的亡金士大夫颠沛流离，生活困顿，甚至达到“人所不能堪”^[5]的地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世侯成了这些亡金士大夫们可能找到的最适当的保护人和赏识者，世侯幕府成了这些亡金士大夫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有所寄托的地方。因此，他们中间除有一部分潜入穷乡僻壤当了隐士而外，相当多的人

[1] 宋子贞：《元故领中书省耶律公神道碑》。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

[3] 同上，卷一二《兰仲文寄诗二十二韵勉和以谢之（又一首）》。

[4]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立政议》。

[5] 参见元好问：《杨奂墓碑》；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内翰李文正公》引《敬斋事迹》，中华书局影印元元统刊本。

陆续投身于各个世侯幕下，成为世侯幕僚。

冠氏世侯赵天锡最早“开学养士”。元好问壬辰北渡以后就长期居于赵天锡幕下。杨奂也入了赵幕。赵天锡虽然势力不大，但由于他开风气之先，对士大夫又十分尊重，因此宾客不少。在冠氏这个小地方，出现了“衣冠会集今为盛”^[1]的景况。1238年，赵天锡出征病还，杨奂入仕蒙古，元好问回故乡太原秀容家居，冠氏赵幕才衰落下去。

各幕府中，大世侯史天泽、严实、张柔的幕府最为著名。就像元好问的弟子魏初后来所说的那样，“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百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竟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2]元好问在1234年到1257年期间，不论寄居冠氏还是家居秀容，他始终同这些主要的世侯幕府保持了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自中州断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3]。他所周流的地点，主要就是真定、顺天、东平以及燕京等处。他的活动的内容固然在于起救断丧几绝的“斯文”，但不仅仅在此。^[4]

真定有世侯史天泽，他后来在忽必烈朝廷里做到右丞相，是有元一代首屈一指的汉人勋臣。史天泽的父祖辈就有“招徕学者”的传统。蒙古灭金后，史天泽“开府真定，登用前金遗老，陈立法制，抚摩疮痍，政化流行，民黎安辑”^[5]。元好问以及王若虚、李冶等名士游依史府，史天泽“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6]。史幕中的著名人物有杨果、张德辉等。元好问到真定，也常住张德辉处，彼此来往尤为密切，后来《遗山先生文集》就是由张德辉编辑类次的。张德辉是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另一个秀民。在世侯幕僚中，

[1]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九《别冠氏诸人》。

[2] 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汝明〕神道碑》。引文中的保定，即原顺天。

[3] 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见《遗山先生文集》。

[4] 施国祁《元遗山先生年谱》：“周旋之间，不过商订金石，评论诗文而已，无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录之赴告，风雅之散亡，惓惓流离迁徙之中，寓访逸征闻之意。庶几野史亭中成此一编一集，冀以尽忠本朝，补救于万一，其力良勤，其心良苦，其志亦良可悲已。”像这样的概述，是把表彰元好问的忠节作为出发点。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八《阎侯〔琛〕墓铭》，《适园丛书》本。

[6]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弘治刊本。

他是较早被忽必烈召问的。张、元同忽必烈的关系，下文将进一步述及。

顺天有世侯张柔。蒙古灭金，张柔战功显赫，元好问后来为张柔撰勋德第二碑时，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作诗赞曰：“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节麟符，以长戎行。……出入行间，勇气益振，每战而辄得志，古难其人。”又曰：“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刚，臣报未终。教子若孙，惟孝与忠。布宣王灵，天地无穷。”^[1] 这些词句，不仅赞扬了张柔，而且歌颂了蒙古国“天子”。进占汴京时，“诸将争取金缯”，而张柔“独入史馆收金实录、秘府图书”^[2]。张柔把这些金代历史文献运到顺天保存了很久。编纂金史是元好问的一大心愿，他曾计划在张柔那里依据金实录来从事编纂金史的工作，但因受到乐夔的阻挠而止。以后张柔把金实录呈交给了蒙古汗庭，元好问还是想直接进入汗庭编纂金史的。

顺天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有王鹗、乐夔、敬铉、郝经等，除了郝经，王、乐、敬等都是元好问名单上的秀民。其中王鹗（1190—1273）是金国最后一位状元（1224），金亡时，一直跟随金主迁蔡。“蔡陷，张柔素闻公名，辇之北渡，馆于保州者十余年”^[3]。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秀民中间，王鹗自然是名列前茅的。在世侯幕府人物中，1244年忽必烈最早召征王鹗到其藩邸。忽必烈十分器重王鹗，“既至，上一见喜甚，赐之坐，呼状元而不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凡圣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不陈于前。上为耸动，尝谕公曰：‘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4] 王鹗也重视金史的编纂。在王邸，他“屡以史事为言，尝举杨奂、元好问、李冶，宜合秉笔”^[5]。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即特授王鹗翰林学士承旨。这时，元、杨已卒，王鹗又举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几乎都是元好问熟识的人士。王鹗本人“在翰十余年，凡大诰命大典册皆出公手”^[6]，在忽必烈前期政治中起了不少作用。

郝经（1222—1274）与元好问之间更有双重的师承关系。郝经的祖父郝天

[1] 《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二《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2] 王鹗：《张柔墓志》，见《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公》。

[3] 徐世隆：《王鹗墓碑》，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4] 同上。

[5] 李昉：《言行录》，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6] 徐世隆：《王鹗墓碑》，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